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治体制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

李盛平 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治体制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

李盛平 等著

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李盛平

副主编：刘在平（常务） 杨百揆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军涛	王志刚	王晓东	白若冰
仝志敏	冯 涛	曲培平	朱 勇
刘在平	刘庸安	孙立平	李 凡
李培华	李盛平	杨 明	杨百揆
吴知伦	闵 琦	肖金泉	沈国锋
怀效锋	陈 鹰	陈云生	郑 秦
张明澍	贺和风	贾 英	徐海宁
彭剑锋	谭 健	缪晓非	黎 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李盛平 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 行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5.25印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

印数 5,000 册

书号：ISBN7—80014—246—9/D·

定价 2.25 元

前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书中的一部分文章，是1986年底前后写成的。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当时书稿虽已编成，但却没有出版。因此，现在出版之后，看起来有些文章中的有些观点与今天理论界的认识是有差距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世人瞩目的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全面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改革的基本设想。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却是1986年的事情。在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中，我和书中的大部分作者也都参加了一些研究工作和讨论会，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是这些研究和讨论的结果。因此，有些文章的论点虽然不够成熟，但作为对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和总结来看，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但我相信，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厂长张成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李盛平

1989年2月

目 录

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李盛平(1)
走出困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	韩康 周为民 卢中原(28)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刘在平(40)
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	张明澍(48)
政治现代化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孙立平(53)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李培华(72)
从现代化看政治决策的危机·····	刘在平(81)
实现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梓 木(95)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若干思考·····	李盛平(108)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党政关系上的改革·····	杨百揆(131)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干部结构的变化	
·····	杨东平(142)
论当前我国改革的出路·····	黎 鸣(149)

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李盛平

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改革。其深刻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繁华的都市到远僻的山村，改革正触动着人们的神经，调整着人们的利益，焕发着人们的热情；第二，从社会政治经济的硬件组织到人们的观念，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冲击和变迁；第三，从局部到全国，改革正从改革家的实验变为全国亿万人民的参与；第四，从经济领域到科技领域、教育领域和政治领域，人们正逐步认识到，改革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改革的独轮车，必须辅之以科技、教育、政治改革的健腿，改革必须是整体改革、总体改革和全方位改革。改革，在全民族全社会的范围内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因此，当代中国改革的设计者邓小平同志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外国评论界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经济改革以其磅礴的气势和深思熟虑的设计全面铺开，它的理论、目标和操作，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虽然经历着阵痛与困难，却在继续深化和加速。但是，其他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似乎没有经济改革那样明确和强烈；对政治改革的地位和进程，很多同志认识模糊，看不清楚。因此，对于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多次谈到政治改革，一部分同志感到突然和茫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部分同志由于历史的教训，认为政治改革问题敏感，难度较大，因而沉默不语；一部分同志认为，我国的政治制度优越，根本没有改革的必要；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政治改革仅仅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搞好了，政治改革问题自然也就

解决了，对政治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人们的思想还不能认同，还有分歧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些认识问题，迎接政治改革的全面展开，本文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政治改革的必然性问题

当前我国即将深入展开的政治改革，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生活中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党和民族的前途，也直接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为了认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的迫切性，自觉地深入地搞好政治改革，我们首先应当研究政治改革的必然性问题，这是我国政治改革的首要理论问题。

1. 政治改革是党和人民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结果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全国性政治大动乱，整整延续了十年。在这十年动乱中，封建主义严重泛滥。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民主受到残暴的践踏，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和公民遭受迫害打击。“文化大革命”的冷酷现实促使我国人民进行历史性的反省和总结。怎样才能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土壤，怎样才能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怎样才能正确解决毛泽东同志和人民觉察到的一些社会问题？经过探索和讨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究竟是个别领袖人物意志的产物还是由更深刻的原因造成的？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因素，一些制度有缺陷、不健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民主革命的时间又太短。我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封

建残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因而不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把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毒素荡涤干净。这种封建毒素与教条主义结合起来，又有小生产的土壤滋养，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个人迷信和政治领导中的家长制作风，由于我国国家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着弊端和缺陷，这两者交叉在一起，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邓小平在谈到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精辟地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①“……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问题、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经验总结，使我们的党和人民终于觉悟到，必须清除封建残余，改革政治体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土壤，克服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才能正确处理毛泽东同志用错误方式而不曾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

2. 政治改革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曾科学地指出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情况：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③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④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建国之初苏联模式的影响，经济建设上“左”倾思想的指导，不发达的生产方式和缺少组织管理的经验，我国形成了一套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死板僵化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以排斥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作为基础的，因此高度集权，政企职责不分，以行政管理为主，既不利于经营管理，也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不坚决改革这种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我国的第三次腾飞根本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无法发挥它的优越性。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大工业社会转变，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转变，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商品经济的核心是等价交换，它要求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追求开拓，追求创新。反应到政治领域，则一方面要求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平等的竞争环境，一方面要求管理经济从高度集权的直接行政管理向分权的间接经济调节转变。政治改革正是这种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

3. 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僵死的封闭社会，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弊端，因而也始终存在着变化和改革。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基本矛盾

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认识的过程,三十年代斯大林就曾宣布苏联不存在这一类性质的矛盾了,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方针上曾出过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清醒的;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即然存在着矛盾,那么,在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前,不相适应的状态势必表现为弊端,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转变和改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处于发展之中。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⑥具体到中国来讲,除了一般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特殊的问题。例如,我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传统,封建宗法思想和小农观念影响较大;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体制僵死。我国各方面体制出现弊端的原因很多,既有斯大林的影响,又有我们自己从革命战争中带来的作法;既有古老历史的惰性,又有我们自己的经验不足。这样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较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更困难、更复杂、更长期、更曲折。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需通过暴力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但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找到一条“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1957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变革和我国国内某些体制需要变革的背景

下，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和意见，当然其中有一些激烈的言辞。由于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党和政府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导致了反右的扩大化，打击了一大批有真知灼见的优秀人才。“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问题的原则被放到了一边。十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同志又背弃了他“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论断，而采取了“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错误方式，结果是使国家陷入十年动乱，加剧了社会矛盾。二十年的历史证明，用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是错误的，是绝对行不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我国政治改革的篇章。经过八年的实践，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改革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只要社会体制存在弊端，就应当用改革的方式来纠正和解决。政治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

4. 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尖锐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⑥。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间，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改善国家机关，曾掀起过四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的改革。1948年苏南关系恶化之后，南斯拉夫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实行工人自治制度，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取消国家计划，向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转变。第二次改革浪潮是以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个人迷信和波兰、匈牙利兴起批判苏联模式的改革思潮为标志，最终因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失控而酿成动乱，以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的悲剧告终。第三次改革浪潮的高峰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67年捷共中央领导改组，杜布切克任第一书记。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行

动纲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运用市场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职工自治；在政治领域，改革党的领导方式，贯彻人民民主原则，改革选举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其深度超过了同期仅在搞经济改革的匈牙利等国。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离开了社会主义”，苏联派出50万军队，突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残暴践踏了“布拉格之春”。第四次改革浪潮发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的范围几乎遍于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趋势不减，浪峰不衰，波兰、中国、苏联的改革，尤其引起世人瞩目。1980年8月波兰“团结工会”的罢工，曾在一段时间内扭转了波兰的改革进程，使第四次改革陷入困境。人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应不应该搞？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能不能搞？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应当如何搞？波兰党和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耐力妥善处理了“团结工会”危机，控制了动乱局面，继续深入改革，圆满地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提供了有控制、有步骤进行改革的模式，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自信心。政治改革，作为“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弊端的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肯定，对我国和苏联也有深刻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11月到1986年初，东欧六个国家即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和苏联，分别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民主求实，坦率而深刻地揭露了党的工作上的弊端，废弃了经济政策上僵化死板的作法，并且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任务。

我国对这四次改革有着不同的评价，采取了不同的作法。建国之初，我们同意苏联的看法，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对批判个人迷信曾采取过赞同的态度，但随着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国内整风运动的发展，我们又放弃了改革

的决心。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时，我国已经陷入了十年内乱，由于与苏联关系破裂，我国强烈谴责了苏联的行动，但并不能正确评价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还认为捷共在搞修正主义。因此我国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道路问题上掉入了极左的泥淖之中。在第四次改革的浪潮中，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批判了过去那一套极左的作法和理论，我们才可能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并且在国内也开始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成为本世纪八十年代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四次改革的经验和实践以及我国对这四次改革的评价和作法，我们可以得出两条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广泛，很多国家虽然受到苏联压制，仍不断提出改革要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任何人也无法阻挠。1968年苏联可以以新沙皇的面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应该在改革和革命之间划等号，改革不限于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社会以及其它领域。”^①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同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发展，改革从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因此可以讲，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

5. 政治改革是我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也是历史进步的潮流，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无论时间早晚，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都必须和必然经历这个过程。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开始寻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它们之间虽然包含着互相否定的成分，但都不失为是一种探索现代化的尝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袁世凯、蒋介石玩弄共和国，实际上仍然维持封

建统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致力于反对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终于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从建国到今天，我们曾前后三次进行了现代化的努力。第一次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完成。在这个时期，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⑧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设想。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⑨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在这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同志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⑩1956年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演讲，进一步深化了现代化的构想。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在六十年代中期。经过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时期之后，在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同志又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问题，并且转达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看法：“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⑪可惜的是，仅一年之后，我国就陷入了动乱之中，现代化的努力被毁之一炬。前两次现代化的努力，由于我们经验少、不成熟，仅仅着眼于经济上的现代化，没有注意到其他方面的问题。第三次现代化的努力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果敢地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我们正逐渐认识到，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它不仅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而且包括政治现代化、观念现代化，否则，四个现代化将无法实现。因此，要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不仅要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因此，政治改革的提出、进行和深入，决不是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凭空杜撰，它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烈内在要求，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采取什么形式，它总是要前进，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二、政治改革的起点问题

正确认识我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始于何时，是我国政治改革深入开展的前提和理论总结的基础。

关于政治改革的起点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改革的起点始于1957年，从1957年以来，政治改革就成为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它实质上是将我国的政治改革与毛泽东同志晚年形成并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混为一谈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才开始，它仅仅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遇到障碍才被推出台来的。这种观点忽视我国的政治现实，忽视了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与取得的成就，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我认为，我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是政治改革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

首先，三中全会从思想路线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三中全会坚决冲破了党的领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

误，全会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⑩ 全会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⑪

其次，三中全会从政治路线上改变了过去那套极“左”的作法。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根据毛泽东同志对我国政治形势作出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⑫ 根据这种估计，三中全会确立了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

再次，三中全会在组织路线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干部问题上保证了政治改革的进行。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坚决处理了一批帮派分子，把他们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全会增选了一批老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际领导地位；全会经过认真核查，为一批蒙受冤屈的老干部平反，纠正了对他们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严肃批判了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批判了他曾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作法。

第四，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问题。三中全会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切实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⑬ 民主制度必须法制化

此三中全会号召：“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③当然，三中全会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并不是非常自觉和明确的，但它为以后明确政治改革的目标提供了基础。

明确三中全会是我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今天继续深入开展的政治改革，既不是脱离我国社会现实的政治谋略，也不是沿袭三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生活中多次重复出现的政治运动；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衍生，也不是外国政治学理论的简单照搬。我国的政治改革，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具体体现，是三中全会阐发的政治理论的实践。明确这一点，才可以使我国的政治改革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地位，也才可以使我国深入展开的政治改革继续沿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发展下去，不致发生大的动荡。

三、政治改革的地位问题

怎样评价政治改革在我国整体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争论。一部分同志单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搞好了，政治方面的弊端自然就解决了，政治改革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衍生物；现在之所以要搞政治方面的改革，也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麻烦，需要政治改革提供服务，例如进行机构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往往认为我国的改革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单项改革，政治改革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他们缺乏进行政治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不能正确看待政治改革特有的规律性和重要性。因此有必要认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认为，政治改革在我国全方位的整体改革中处于重要的地